

向晨为例,略作阐述。张世英提出把西方近代“主体—客体”关系式吸取和充实到中国传统(包括儒家)的“万物一体”的精神境界中来,形成“中国式的‘后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①张祥龙著有《家与孝:从中西间视野看》,进行“孔子的现象学阐释”,认为孝是儒家的根本、中华文明的基石,而在西方价值体系中从没有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但西方哲学中广义的现象学为探寻孝的哲学基础提供了新的思路。倪梁康从其老师(瑞士现象学家耿宁)的研究成果出发,沟通胡塞尔现象学与王阳明心性学说,认为现象学为心性论研究提供了本质直观和超越论的还原的方法,形成“心性现象学”。孙向晨的《家:个体与亲亲》比较了中西文化叙事中的“家”,主张以源于西方传统和儒家传统的“个体”和“亲亲”,作为“双重本体”来形塑现代人的“家”,让“归家”成为现代人的共同命运。他们“跨界”的研究成果,是近些年儒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话题。这实际上是把儒学引入了与世界上其它思想的百家争鸣。

这些在学术中国化背景下的儒学研究新向度,都体现了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化文明的思考。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高度契合性研究”(编号:23ZDA009)的阶段性成果。

近十年来儒学研究的客观评估

黄玉顺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十年来儒学研究趋势的回顾与前瞻是一个大题目,因为它涉及的是儒学研究的一种重大转变;这种转变,如果不能说是“时代性”的,也是“历史时段性”的,这取决于怎样理解“时代”概念。^②

简单来说,这种转变就是:儒学研究从“民间”的和学者自发的活动,或者说“非官方”的状态,转变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

谈到“转变”,当然涉及转变前后的对比。众所周知,儒学的复兴并不是最近十年才发生的。关于中国当代的思想学术,我曾经有一个概括:20世纪的80年代是“思而不学”,当时引进了很多西方的哲学和思想,但都是囫囵吞枣式的译介,缺乏本土的尤其是能够让西学与儒学会通的学术支撑;90年代是“学而不思”,当时由于众所周知的缘故,学者们一头扎进“故纸堆”,却也逐渐积累起比较厚实的本土学术功底,但绝口不谈思想,李泽厚称之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③但是,进入21世纪,在这十年之前的那十年,上述“思想”与“学术”两个方面开始结合起来,产生了若干既具有原创思想、又具有相当的学术功底的儒学研究,特别是开始出现一

① 张世英:《九十思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31页。

② 黄玉顺:《儒家文明发展的时代问题》,《国际儒学》2021年第3期。

③ 黄玉顺:《生活儒学与中国正义论——从我研究儒学说起》,《深圳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些标志为“XX 儒学”的理论建构。^①

21 世纪的这种新兴的儒学研究,应当与 20 世纪的“现代新儒学”区别开来,或可称之为“当代新儒学”^②,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但远不限于所谓“大陆新儒家”^③。

所以,我刚才讲的最近十年的转折,其实就是“这十年之前”和“这十年以来”这两个时间段之间的转折。“这十年之前”的儒学研究是“民间”的和学者自发的,即“非官方倡导”的;而“这十年以来”的儒学研究,则与“官方倡导”密切相关。

但是,尽管如此,我在这里要特别指出一个客观的情况,这样才可能真正完整地理解所谓“近十年来的儒学研究”。作为一种不带任何价值判断的、客观的观察,这个实际情况就是:近十年来,其实并非所有的儒学研究都可归入主流意识形态的范畴。

这与一个更宏大的“时代”背景相关,那就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三元格局”,即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④所谓“文化保守主义”,实际上主要就是指 20 世纪的现代新儒学。^⑤

由此观察,不难发现:“这十年以来”的儒学和“这十年之前”的儒学之间,乃至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儒学之间,有一点并未改变,那就是这种多元化的“三元格局”:有的儒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会通,有的儒学研究与自由主义会通;还有的儒学则是复古主义的,即所谓“原教旨儒学”。

不过,这里需要作一个特别的说明:“儒学与自由主义会通”这种措辞其实并不确切。严格来讲,这里应当分为两种进路。借用美国政治哲学家安靖如(Stephen C. Angle)的概念,一种进路是“无根的”,即是以西方自由主义而非中国儒学为根基的;而另一种则是“有根的”(root-ed)^⑥,即是以儒家的自由观念为根基的。

对于上述“三元格局”,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正因为如此,我曾经这样讲过:

他们并非统一的学派;恰恰相反,其思维方式、思想观点、价值取向、政治立场等颇为不同,甚至相去甚远,乃至截然对立:有原教旨主义者,有马克思主义者、新左派,还有自由主义者,等等。他们之间唯一的“底线共识”,似乎仅仅只是“儒家”这个标签。^⑦

鉴于上述价值分裂,儒学已经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学术派别,而成为了各种不

① 黄玉顺、赵立庆:《生活儒学与“古今中西”问题——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生导师黄玉顺教授访谈》,《社会科学家》2017 年第 1 期。

② 徐庆文:《应当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学”》,《社会科学研究》2013 年第 2 期。

③ 黄玉顺:《也论“大陆新儒家”——回应李明辉先生》,《探索与争鸣》2016 年第 4 期。

④ 黄玉顺:《儒学之当前态势与未来展望》,《孔子研究》2018 年第 4 期。

⑤ 黄玉顺:《“文化保守主义”评议——与〈原道〉主编陈明之商榷》,《学术界》2004 年第 5 期;《文化保守主义与现代新儒家》,《读书时报》2005 年 11 月 30 日;《当前儒学复兴运动与现代新儒家——再评“文化保守主义”》,《学术界》2006 年第 5 期。

⑥ 黄玉顺:《儒学之“本”与“源”——评安靖如“进步儒学”的思想方法》,《烟台大学学报》2014 年第 1 期;黄玉顺、安靖如:《生活儒学与进步儒学的对话》,《齐鲁学刊》2017 年第 4 期。

⑦ 黄玉顺:《论儒学的现代性》,《社会科学研究》2016 年第 6 期。

同思想学术派别的公共话语资源,人们用儒学话语来表达截然不同的价值立场。^①

这就是我所说的“客观评估”。

以上算是“回顾”;至于“前瞻”,作为一种不带任何价值判断的客观评估,那么,我的估计是:上述格局仍然不会发生根本改变。更准确地讲:会发生改变的只是“量”的对比消长,而不是“质”的格局变化。

全面恢复经学教育,真正落实新时代的文化自信

舒大刚

(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兼古籍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们都知道,每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民族都有自己的经典,经典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精神家园和力量源泉。中华最早期的经典就是儒家经典,这是中华文化的根、魂、源,在历史上的影响非常巨大。对经典进行研究阐释并引以为行动指南、思想引领(常道)的学术就是经学。经学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的作用十分突出,历史上很多大家、名家,无论是修身立业,还是立说垂教,都要从经典和经学入手,促使经学对中国文化方方面面都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就如当代的一些大家名师(如范文澜)强调的那样,“不了解经学就不能正确认识中国的历史”;金景芳先生也说,“研究中国古史分期、发展阶段、宗法、井田、哲学,甚至古代官制、礼制、兵制、学制等,都不能不研究经学”;李学勤先生也说过类似的话,当代学人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就更多了。

经学是中华历史文化的源头活水。以孔子为中心,我们认识前面二千五百年的历史文化要通过经学,认识后来二千五百年的历史发展也要通过经学。经学的历史意义和永恒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从当代文化建设来看,经学的作用也是多方面的。经学蕴涵着解决人类社会难题的“中国方案”。2014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在庆祝孔子诞辰2565周年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当前人类社会面临许多难题,“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大同世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为政以德、政者正也,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仁者爱人、以德立人,以诚待人、讲信修睦,清廉从政、勤勉奉公,俭约自守、力戒奢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等等思想。这15条解决人类难题的“中国方案”,除“道法自然”见于道家经典《老子》外,其他全都出自儒学经典。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① 黄玉顺:《儒学的现状、教训与经验——政治哲学层面的观察与思考》,《生活儒学与现代性问题》,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51—256页。